

# 新时代深化毛泽东研究的三重理论维度<sup>①</sup>

张明

(南京大学哲学系,江苏南京 210046)

**摘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步入新时代的历史条件下,深化与拓展毛泽东研究,需要从理论谱系、历史遗产与研究方法三重维度进行突破。对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关系的研究,需要不断突破宏观层面的“定性研究”,进一步深入到微观层面的“定量研究”;科学而全面地对待毛泽东历史遗产,尤其是晚年社会主义实践的遗产,需要努力做到在正确政治导向指引下展开科学理性反思,以期有益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深入推进;不断深化对传统研究方法的自我反思、自我批判,在此基础上不断实现方法论的自觉更新与自我发展,以期彰显毛泽东研究新的理论图景。

**关键词:**毛泽东研究;理论谱系;历史遗产;研究方法

**中图分类号:**A8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4970(2018)02-0052-06

毛泽东是20世纪中华民族历史上的“里程碑”人物,在中华民族求索伟大民族复兴的历史征程中产生了空前而深远的影响,这种影响并未随着其生命的消逝而消失,反而呈现出更为强烈的持续性影响。美国著名传记作家埃德加·斯诺早在1936年采访毛泽东时就曾明确指出:“毛泽东生平的历史是整整一代人的一个丰富的横断面,是要了解中国国内动向原委的一个重要指南”<sup>[1]</sup>。其实,毛泽东的影响在一定意义上已经超越了特定空间性与时间性限定,而对世界历史产生了广泛而持久意义。这种持续性影响在某种程度上构成了一个时代的“符号”,并向后无限延伸其思想的逻辑射线。20世纪中叶,毛泽东成为广大第三世界国家谋求民族独立与解放的“象征”;60年代,毛泽东成为西方学生运动的“偶像”与“政治符号”;当下,毛泽东更是成为西方左派代表,成为目前学界炙手可热的阿兰·巴迪欧、齐泽克等学者批判资本主义的“理论资源”<sup>[2]</sup>。正如国外有学者所指出的那样,毛泽东在当代中国的持续性影响,不仅因为其是一位重要历史人物,而且在于他的理论与实践仍然构成当代

中国政治的基础性内容<sup>[3]</sup>。

然而,纵观近年来毛泽东研究的基本现状,从总体上来看,相关研究正呈现出某种程度上的式微局面。这主要体现在如下两个方面:一是国内研究缺乏新的理论生长点,许多研究尚且停留在表层维度的重复性“炒冷饭”,难以实现向理论纵深的挺进;二是国外毛泽东研究随着老一辈研究者,例如施拉姆的相继离世以及因意识形态因素淡化,作为“政治象征物”的“毛主义”不断衰退以及关于毛泽东研究学术兴趣的减弱,使得国外毛泽东研究的新生研究力量比较缺乏,甚至出现某种程度的“断层”现象。因此,如何进一步推动毛泽东研究的理论深度、拓展研究的宽度,如何发掘新的理论生长点、找准研究的着力点,是当前必须要加以重视的重要问题。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步入新时代<sup>[4]</sup>,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与发展。如何科学理解二者之间的辩证逻辑关系,其首要前提便是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深化拓展对毛泽东研究与思考的空间。本文拟从理论谱系、历史遗产与研究方法三个维度加以

收稿日期:2017-12-14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17CKS006)

作者简介:张明(1987—),男,江苏溧水人,博士,助理研究员,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当代中国问题研究。

①2017年11月22日,由南京大学提议召开的“首届全国毛泽东研究青年学者论坛”在南京召开,来自中国人民大学、清华大学、中山大学、湘潭大学、南京大学与中国社科院、湖南省社科院等高校和科研机构的60名学者与会,会议主题为“深化毛泽东研究的前瞻性思考”。本文的主要内容作者在大会闭幕式上所做的总结发言。

切入,期冀构建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背景下深化拓展毛泽东研究的学术理路。

## 一、理论谱系: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关系研究的深化

从总体上而言,目前学界对毛泽东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间关系的研究,主要有两大理论关注点。一是毛泽东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实践贡献,二是毛泽东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理论贡献。前者偏重于现实层面的实践积累,诸如,较为完整的工业化体系与国民经济体系;而后者更侧重于理论层面的思考与探索,其中最为显著的即是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关系研究。纵观学界关于这一问题的现有研究,主要集中在如下两个方面:

一是从理论逻辑上探讨二者之间的逻辑关联。即一方面从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理论渊源”角度出发,论证二者之间的“一脉相承”性。其中,毛泽东思想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的“第一次结合”“第一次飞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构成了“第二次结合”“第二次飞跃”。另一方面,从思想基础、政治前提、制度保证、方法论指导和重要观点启示等方面,揭示毛泽东思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指导性意义;二是研究二者之间的内在区别。在此问题上,学界普遍从它们所处的历史时期、所面临的历史任务与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等方面出发,阐释二者之间的区别。即毛泽东思想是“革命逻辑”的表征,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则是“建设逻辑”的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产生于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条件下,与毛泽东时代传统社会主义建设模式具有重大区别。

上述内容构成了目前学界关于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相互关系的主体结构,从整体上勾勒了二者的基本关系图景,是研究过程中必须要加以遵循的基本理论路径。但从整体上而言,上述研究倾向更多地停留于宏大叙事层面,对二者关系研究是从宏观层面所做的“定性研究”,而缺乏细微的“定量研究”。并且,仅仅将毛泽东思想界定为“革命逻辑”层面的理论定位,与从“建设逻辑”层面出发,寻求毛泽东思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逻辑支撑,存在着一定的逻辑非连续性。此一问题直接关涉对毛泽东思想中关于“社会主义建设”具体内容的自主性“屏蔽”。尽管学界承认毛泽东晚年艰辛探索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开启提供了重要参照,但这些研究都基本上停留于宏观层面的勾勒,而缺乏向微观研究的深入。例如,毛泽

东时代社会主义建设的哪些具体措施或制度,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仍然具有启示或借鉴意义,对当下影响的作用机制又是如何呈现等,这些细节性内容仍然有待于在研究中进一步加强。

当然,忽视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建设探索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具体性”联系的研究倾向,是由多重原因所导致的。一是毛泽东晚年关于社会主义建设探索的深刻教训,导致基于特定考量的“淡化”处理。但是,毛泽东社会主义建设的艰辛探索又包含着中国共产党人的宝贵历史经验。因此,在上述双重矛盾性因素相互交织的复杂背景下,为了避免产生认识上的混乱,对毛泽东晚年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不得不采取从宏观层面加以总结与归纳,即“总结过去是为了引导大家团结一致向前看。历史上重大问题的议论到此基本结束”<sup>[5]292</sup>。二是由于长期形成的关于毛泽东思想即“革命逻辑”定位的“思维惯性”,使得学术界无意识的“遮蔽”毛泽东社会主义建设具体实践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构的具体性启示。着力突破关于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关系的单纯“定性研究”,拓展到从微观层面的“实证化”“精细化”阐释,内在构成了当前深化毛泽东研究的一大着力点。

需要指出的是,强调从微观层面研究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间关系,并非是为了否定从宏观层面的相关研究,而恰恰是在宏观层面研究的基本理论指导下进行的补充与完善,是为了进一步拓展深化二者关系研究的一种新型尝试。并且,这一尝试与1981年通过的“决议”中关于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定位并不矛盾,“决议”只是从指导思想层面、从基本理论框架层面所做的整体式判断,是毛泽东研究所必须遵循的基本“红线”,对于具体问题的研究需要在遵循“决议精神”的基础上进行细化深入。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建设方面的经验教训,这些内容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借鉴与启示意义,不能采取人为回避的态度,应该从总结经验成为宝贵财富的立场出发,进行进一步深入研究与思考。可喜的是,国内外有部分学者已经开始了突破单纯“宏大历史叙事逻辑”限定,而逐渐注重从微观层面出发理解毛泽东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间的关系问题。例如,中山大学徐俊忠教授带领的团队回到毛泽东时代具体历史情境,通过对历史真实状态的阐释,以期真实完整地展现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探索的具体情境,并从中汲取对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有益的合理性部分<sup>[6]</sup>。国外一些学者也开始突破传统西方学界全盘否定毛泽东社会主义建设的路数,开始着力从历史的细节

出发重新思考毛泽东晚年社会主义建设探索的当代意义。例如,英国学者克里斯·布拉莫尔教授就坚决反对毛泽东时代经济建设是“最后的罗曼蒂克”的观点。在他看来,毛泽东时代的经济遗产,诸如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重新组织化对于推动农业工业化、机械化的显著意义不仅体现在20世纪70年代农村经济发展,而且也为了80年代中国经济的腾飞奠定了坚实基础<sup>[7]</sup>。

由此观之,在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间关系研究中,实现从“宏大逻辑”向“微观层面”的转移,主要是为了通过回到历史的原初语境,科学认识毛泽东的时代及其为后世留下的历史遗产。这种“微观化”“具象化”范式的深入,不是为了揭露毛泽东时代的所谓“灾难性”后果以突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价值与意义,而是为了实现科学理解前后两个30年之间的逻辑关系,这构成了事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未来发展路径的重要政治问题。尤其是在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步入新时代表背景下,如何深入研究毛泽东思想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之间的逻辑关系,如何从学术层面进一步细化二者之间继承、创新与发展之间的辩证关系,将构成当前毛泽东研究的一大学术生长点。

## 二、历史遗产:毛泽东研究的原则性与科学规范化生成

毛泽东的影响,并未随着其个体生命的消逝而消失,相反在一定条件下呈现出影响力不断增强的趋势。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那样,毛泽东研究在当代中国正呈现出愈发重要的意义与影响<sup>[8]</sup>。就毛泽东为后世所留下的历史遗产问题而言,这一问题蕴含着丰富性与复杂性为一体,如何认识、对待毛泽东的历史遗产问题,也构成了当前中国政治社会争论的焦点。国外毛泽东研究专家尼克·奈特认为,毛泽东的思想及其实践如同一面棱镜,每当棱镜发生转动时,它所折射出的光景——毛泽东的思想肖像也是各不相同的<sup>[9]</sup>。也就是说,不同主体基于不同立场、情怀与目的,对毛泽东历史遗产的理解具有重要的差异性。因此,如何科学把握并消化、吸收毛泽东的历史遗产,以使其有益于当下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发展,是理论与实践所共同提出的重大问题。

首先,需要回答的一个问题便是何谓毛泽东的历史遗产?所谓历史遗产即是前世留给后世的、对后世发展具有特定功用性的物质和精神文化的总和。很明显,毛泽东留给后世的历史遗产,最为显著

的便是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经过实践证明的科学理论体系与集体智慧的结晶。对于此份历史遗产,中国共产党人已经将其写入党章,并视为党长期要加以坚持的指导思想。当然,需要明确的是,由于毛泽东思想的跨度主要集中在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因此必须清醒地辨别毛泽东思想与当前所进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之间存在的“间距”问题——尽管前者为后者提供了基础性的理论指导,但由于二者实践主题之间存在的差异,上述历史性间距是不能被人为抹去的。因此,当前历史条件下,坚持毛泽东思想主要不在于坚持毛泽东思想中的具体结论或观点,而是坚持其“活的灵魂”的方法论指导意义。在毛泽东的历史遗产中,是否毛泽东思想构成了其唯一的存在形式?除此之外,是否不存在其他需要继承的历史遗产?其实不然,毛泽东为后世留下了“双份历史遗产”,即毛泽东思想与毛泽东晚年错误教训,二者都是我党的宝贵财富<sup>[10]</sup>。从某种程度上而言,毛泽东晚年的历史遗产对于当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可能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因为对错误教训的科学总结可能更加深刻、对于实践可能更具有指导意义。并且,对毛泽东晚年错误教训的科学总结是建立在我们付出重大代价基础之上获取的,所以更彰显其珍贵性之所在。正如恩格斯所言:“伟大的阶级,正如伟大的民族一样,无论从哪方面学习都不如从自己所犯错误的后果中学习来得快”<sup>[11]</sup>。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要全面、辩证、历史地看待毛泽东晚年的探索性教训,“失误和错误连同党的成功经验一起成为宝贵的历史教材。”<sup>[12]</sup>

其次,缘何要重视对毛泽东晚年历史遗产的研究?重视对毛泽东晚年历史遗产的研究,主要有现实与理论的两个针对性“问题域”。一是目前学界与社会上存在的关于毛泽东晚年错误的歪曲与误导,批判性回应毛泽东研究中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离不开对毛泽东晚年历史遗产的深入研究。如前所述,目前关于毛泽东思想这一历史遗产的意见相对比较统一。但是,近期由于受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泛滥的影响,关于这一问题的认识却产生了一些新的分歧。例如,历史虚无主义思潮采取全盘否定的态度对待毛泽东理论与实践,尤其是通过对探索社会主义建设曲折的渲染与无限夸大,以实现从根本上否定毛泽东及其思想,并进而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目的。这种倾向从根本上违背了“决议”中关于毛泽东“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sup>[13]</sup>基本判断,直接干扰了中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方向。正因为如此,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明确指出:必须“坚定不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sup>[14]</sup>。上述错误倾向,是由对待毛泽东晚年问题所直接生发出来的。二是通过对毛泽东晚年历史遗产的充分全面研究,有利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胜利推进。一方面,毛泽东晚年社会主义实践的困境,直接推动了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重新思考与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问题,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局面。正如邓小平所言,“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今后相当长的时期,还是做这件事。”<sup>[5]</sup><sup>300</sup>另一方面,毛泽东晚年的若干理论与实践对于当下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仍有积极启示意义。诸如,毛泽东晚年关于反对官僚主义、等级制度与特权的思考,防止社会主义红旗变色的忧虑,这些深刻的思考仍然具有现时代的价值与意义。可以预见的是,关于毛泽东晚年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及其教训,在今后相当一段时间内将构成毛泽东研究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再次,如何正确认识毛泽东晚年历史遗产?科学把握其晚年的理论与实践的本质是正确认识得以建立的前提,毛泽东晚年理论与实践的根源在于其理想的社会主义模式。无论是从青年时期锻造“新民”、创立“新村”的理想,还是革命战争年代的以“平均主义”“供给制”和“革命的大无畏牺牲精神”为特征的“延安道路”,亦或是毛泽东晚年极力推行的“人民公社”、消灭“三大差别”的理想蓝图,浪漫主义与理想主义的气息贯穿毛泽东的思想发展的始终。毛泽东晚年理论与实践,最终可以归结为力图尽快实现其所设想的理想社会主义模式:以公有制为基础、以平均主义为主要特征,以夸大人的主观能动性、牺牲精神为手段,辅助于阶级斗争的方式,实现共产主义的理想蓝图。“毛泽东实现社会主义目标,一是要求快,二是要求好。快,就是只争朝夕,尽快建成社会主义;好,就是社会主义要尽善尽美,彻底与资本主义和旧社会决裂”<sup>[15]</sup>。从根本上而言,理想主义是毛泽东晚年探索性失误的症结之所在,而这在理论上与实践上又呈现出特定的经验主义情结,即因为建设社会主义这一前无古人的探索性实践所限,不得不转向对以往战争年代革命经验的向往与依赖,这是由历史与时代所限而导致的特定局限性。

最后,如何科学对待毛泽东晚年历史遗产研究?

当下,研究毛泽东晚年历史遗产,需要超越双重形而上学思维(全盘肯定与全盘否定两个极端)限制,实现在“决议”精神的指导下的实事求是研究。脱离上述指导性原则,必然会将研究工作引向要么回到毛泽东时代的“老路”,要么是回到以否定毛泽东为基础、进而否定中国共产党领导、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虚无主义的“邪路”。对毛泽东晚年历史遗产的研究,并非是一个单纯的历史学问题,而是一个关涉当下实践的重大现实问题。因此,这一研究的立足点并非是为了回到过去,而是通过历史衔接当下并走向未来,即研究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服务于当下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在确立科学对待毛泽东晚年历史遗产的立场之后,需要找准深化对这一问题研究的具体路径。一方面,需要从历史的原初语境出发,客观对待毛泽东晚年的理论与实践,并着力从中找出有益于当下实践的宝贵财富。因为毛泽东晚年的理论与实践并非是完全错误的,而是正确与错误相互交织的复杂集合体,需要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为指导,辩证分析并加以合理掘取。例如,国内有学者以毛泽东关于“苏联模式”的批判性思考为切入点,通过客观历史性学术研究与认知性研究方法,以期勾勒出毛泽东晚年探索的当下价值与意义<sup>[16]</sup>。另一方面,需要科学分析毛泽东晚年探索性失误的原因。在这一问题上,需要摒弃情感与政治的纠葛所形成的理论暗角,从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境遇这一宏大历史背景出发加以综合考虑。毛泽东晚年关于社会主义建设探索的失误,受其历史与时代原因所限——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语焉不详与现实社会主义建设实际经验的有限性,呈现出特定的理想主义的特征,即超越了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阶段性,使得理想与现实相脱节,最终走向了理论上的某种“主观主义”。

### 三、研究方法:自我反思与全新图景的彰显

研究方法在理论研究中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因为任何研究都是在特定“理论前见”或“问题式”“座架”之下开展的。以不同理论面对同一文本,可能会展现不同的甚至是截然相反的理论景观。目前毛泽东研究新的理论生长点之所以难以构筑,其中重要原因之一在于缺乏新方法论的引入。因此,关于方法论的自我反思与自觉更新,构成了当前深化毛泽东研究的重要问题之一。

首先,树立正确的政治立场与理论导向是毛泽东研究工作科学开展的前提。毛泽东研究不同于一般单纯思想家的研究,因为他在中国近代史历史尤

其是中共党史上的特殊地位与普遍性意义,决定了在研究中首先必须树立正确的政治导向性。在不同理论导向或政治立场的指引下,可能会导致对毛泽东的思想肖像截然相异甚至直接对立的勾画。国内外一些学者基于特定的意识形态因素,本着否定、歪曲毛泽东及其思想的目的而开展研究,因而必然会导致居有特定狭隘的理论偏见,即要么刻意贬低毛泽东的思想高度,要么歪曲或侮辱毛泽东的政治品格和道德品质。在上述先入为主的歪曲价值预设基础上,必然导致研究方法的特定局限,即片面攫取其所需材料,对与其立论基础相符的材料高度重视,而对与其立论相反的材料则视而不见甚至人为剪裁。因此,其对毛泽东的思想肖像的勾画,必然是歪曲的“漫画像”。毛泽东研究必须在坚持正确政治导向基础上,反映研究的学术性、科学性;在研究的学术性与科学性之中,凸显正确的政治导向性。即是说,必须从“决议”基本精神出发,实事求是地勾勒毛泽东的真实思想肖像。

其次,关于传统研究方法的自我反思是推动毛泽东研究新的理论生长点构筑的重要保障。尽管可能有论点会认为,由于毛泽东在政治上的特殊性,目前研究的主要困难在于难以全面而真实的占有毛泽东的文本。但实事求是而言,随着以《毛泽东文集》《建国以来毛泽东重要文稿》为代表的“综合性文集”和以《毛泽东书信选集》《毛泽东军事文集》等为代表的“专题文集”地公开出版发行,加之官方权威版本《毛泽东年谱》关于大量原始材料的公布,使得在史料占有上较之于以往有很大进步。因此,正如学者所言,“现在主要的不是研究的档案文献太少,而是对这些档案文献利用不够,下功夫去研究不够”<sup>[17]</sup>。这里所谓的“功夫”,在某种程度上直接关涉研究方法问题。目前,毛泽东研究领域存在的以同质化与宏观化思路为代表的基本研究倾向,人为将毛泽东的思想理解为只是“同质性”思想因子的线性流变过程,而忽视对思想断裂处“异质性”因子的动态捕捉;所谓宏观化解读思路即是从宏大历史背景出发,以“宏观解读”研究范式把握毛泽东的思想,亦即通常所言的历史唯物主义整体性解读方式。然而毛泽东的思想及其实践的复杂性特征,使得仅仅依赖宏观解读思路,无法实现对毛泽东的思想肖像的丰满性勾画。徐俊忠教授所提倡的“认知性”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就是针对目前宏观化思路的不足所作<sup>[18]</sup>。在高度重视“认知性”(“细节真实”)研究在毛泽东研究中不可或缺重要基础性地位的同时,有学者还提出需要重视对“本质真实”的科学把握,而所谓“本质真实”,即是从历史发展的宏大线

索出发加以理解<sup>[19]</sup>。因为对宏大思路进行反思,并非要从根本上否定这一思路。脱离历史唯物主义宏大视角的毛泽东研究,必然会陷入主观唯心主义的理论泥潭,从而导致非历史、非现实勾画毛泽东的思想肖像。例如,一些学者对毛泽东的思想的勾画,尽管其立论所依据的大部分材料都是公开出版物,因而具有一定的可信性。但问题是,“细节真实”与“本质真实”之间存在着巨大的“断裂”,尤其是居于特定理论偏见对所谓“材料证据”的运用,往往会不自觉的陷入“证据陷阱”之中。因此,“细节真实”与“本质真实”应是相辅相成、相互补充的关系,必须加以综合利用。

第三,研究方法的自觉更新是毛泽东研究全新理论图景彰显的重要途径。针对传统研究方法存在的局限性,必须引进“异质性研究”与“精细化解读”,以不断拓宽毛泽东研究的理论视域,构筑新的理论生长点。“异质性研究”注重发掘不同历史发展阶段与不同理论特质所组成的动态、复杂的理论结构体,将思想的形成和发展视为由“异质性”因子相互角逐的产物。因此,“异质性”研究方法反对“预设目的论”在毛泽东研究中的主导地位,力图探索思想发展的微观动态过程,其不仅关注思想向何处发展以及为何相此处发展,而且更为关注思想如何实现此种发展;所谓“精细化解读”是直接针对“宏观化思路”而作,与“认知性研究”——尽量剔除价值先行、尽量逼近历史真实——有异曲同工之处。实现“精细化”解读目标,一方面需要“重估”以往长期形成的定性思维与定论,返回思想与实践的“原初语境”,以实事求是的态度科学揭示其真实生长状态;另一面“精细化解读”需要建立在对材料真实而全面的占有基础之上,从史料出发,努力做到“论从史出”“言之有据”。此外,毛泽东研究还需要不断拓宽研究的宽度,不断推动跨学科研究、交叉研究,鼓励越来越多依托当代哲学社会科学最新方法论的拓展性研究,这也构成了深化毛泽东研究方法论更新的重要支撑点。

最后,从新时代的全新语境中定位毛泽东及其理论实践,以推动毛泽东研究的当代关联。深化毛泽东研究具有两条路向,一是从纯粹学术理路层面研究毛泽东的思想,例如,就对毛泽东思想体系中的某个概念或理论展开深入的考证、推理与归纳概括,这是一种学院化的研究思路;二是从当代中国现实实践场域出发,尤其是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出发,将毛泽东的研究与当代中国现实相挂钩,这是一种走出书斋、面向现实的研究思路。从理论的产生机制上看,社会实践是理论创制的根

本动力,只有源于生活、面向实践的理论,才具有充分的生机与活力。因此,作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重要组成部分的毛泽东研究,不能将其规制于脱离生活与现实的学院式研究,而需要始终发挥马克思主义解释世界与改造世界有机统一的理论品格,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现实语境中定位毛泽东研究的时代价值。深化毛泽东研究的当代关联性,可以从如下两个方面加以入手:一方面,从毛泽东的思想与实践的合理性因子出发加以发掘。例如,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面临着诸多新情况、新问题与新挑战——社会主要矛盾的深刻变动、探索中国现代化道路的多元挑战等。这些问题与挑战,在一定程度上都可以从毛泽东的理论探索中得到某种程度的借鉴与启示。诸如,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矛盾问题,尤其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思考与探索,为新时代求解社会主要矛盾提供了重要理论支撑;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问题的探索性思考,对于当下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仍具有重要启示意义<sup>[20]</sup>;毛泽东立足于中国实际、以社会主义为基座展开求索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艰辛探索,为新时代丰富和完善以“中国道路”为代表的现代化之“中国方案”与“中国智慧”提供了重要参考性意义;另一方面,毛泽东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曲折经历与深刻教训,从总结经验变成宝贵财富的角度来看,为深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重要借鉴。因为反观毛泽东晚年探索的失误——脱离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际、过急过纯地追求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目标的达成,可以得出如下结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健康持续发展,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指导,坚持从现实出发,不断趋向理想目标,实现理想与现实具体的、历史的统一。

总言之,深化毛泽东研究必须要有强烈的问题意识与使命意识,推动毛泽东研究从单纯人物研究转向问题研究,推动毛泽东研究与当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结合。在此过程中,应在坚持正确政治导向基础上,进一步促进毛泽东研究的学术化与规范化生成,更加注重从理性层面、从学术层面发挥毛泽东研究的理论性与社会性功效,更加注重新的研究方法的引进与综合利用,更加注重拓展毛泽东研究的广度与深度。

#### 参考文献:

[1] 埃德加·斯诺. 西行漫记[M]. 董乐山,译. 北京:三联

书店,1979:62.

- [2] 张剑. 齐泽克、巴迪欧的毛泽东情结[J].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3(6):113-119.
- [3] CHEEK T.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to Mao[M].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0.
- [4] 习近平.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10.
- [5] 邓小平. 邓小平文选: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 [6] 徐俊忠. 毛泽东与当代中国——认知性研究的视角[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24.
- [7] BRAMALL C. The last of the romantics? Maosit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retrospect [J]. The China Quarterly, 2006,187:686-692.
- [8] 李戈. 毛泽东研究的生长点与新趋势[J]. 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3):8-15.
- [9] KNIGHT N. Rethink Mao:Explorations in Mao Zedong's Thought[M]. MD: Rowman&Littlefield Publishers,2007:3.
- [10] 刘林元. 毛泽东的两份历史遗产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J]. 中共南京市委党校学报,2010(4):5-11.
- [11]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32.
- [12] 习近平. 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12.
- [1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读:上册[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331.
- [14] 胡锦涛.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12.
- [15] 刘林元. 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左”倾错误原因论析[J]. 扬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4):5-12.
- [16] 徐俊忠. 毛泽东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几个问题再探讨[J].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0(6):105-111.
- [17]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组. 《毛泽东文集》与毛泽东思想[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42.
- [18] 徐俊忠. 关于毛泽东的认知性研究方法论要[J]. 马克思主义研究,2016(1):105-111.
- [19] 李佑新. 建构理想与现实的合理关系——毛泽东思想的一个重要特征及其当代发展[J].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3(6):153-157.
- [20] 刘正妙. 毛泽东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思想述论——以1958年第一次郑州会议至1959年庐山会议前夕的“纠左”为中心的考察[J]. 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18(4):21-26.

(责任编辑:许宇鹏)